

書名：《中國翻譯話語英譯選集(上册)：從最  
早期到佛經翻譯》

作者：張珮瑤

出版社：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 年 5 月

頁數：268 頁

2011 年,教育部、財政部聯合印發了《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繁榮計劃(2011—2020 年)》,教育部研究制定了《關於進一步改進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評價的意見》、《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建設計劃》、《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走出去”計劃》等配套方案,推動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繁榮發展。因此,哲學社會科學學術外譯已經成為“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和教育部“推動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繁榮發展”等政策導向下的必然趨勢。中國傳統翻譯理論是中華民族悠久翻譯歷史和民族交流的產物,然而,近年來由於西方翻譯理論和流派的壓倒性影響,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重要內容之一的中國傳統翻譯理論在翻譯研究界日漸式微,逐漸喪失了話語權,“中國學界長期處於劣勢,並出現了‘失語’的現象”(張旭,2008)。張珮瑤先生(1953—2013,下稱“張先生”以示尊敬)鐵肩擔道義,主持編譯了《中國翻譯話語英譯選集(上册)：從最早期到佛經翻譯》(*An Anthology of Chinese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 Volume 1,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Buddhist Project*,下稱“《選集(上册)》”),可謂治療中國翻譯文化“失語症”的一劑良藥。2006 年底,《選集(上册)》由 St. Jerome 出版社出版,成功地進入國外主流學術圖書市場,向國外學界介紹了中國的學術成果,廣受國內外讀者的

歡迎和高度贊譽,有力地促進了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走出去”工作,成為我們學術外譯推動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成功典範。《選集(上册)》共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收入 25 個條目,主要選自儒道經典。第二部分是本書的重心,收入 57 個條目,絕大部分是從東漢到宋代的佛經翻譯論述。材料取自漢譯佛經的序跋和歷代高僧的傳記,涉及到佛經翻譯的方方面面,包括文質與繁簡問題、源本問題、格義問題、名義問題,以及譯場的組織與分工等。《選集(上册)》採用資料彙編的形式,系統梳理了中國古老的翻譯實踐及翻譯理論的發展脈絡,遵循獨特的選、譯、評、注原則,按照時間順序詳盡地展示出一幅宏大的中國傳統翻譯話語畫卷。《選集(上册)》後被收入“國外翻譯研究叢書”,由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2010 年影印出版,反哺國內翻譯研究者,達到了內外並濟的出版效果<sup>[1]</sup>。

## 一、提高文化軟實力, 增強學術話語權

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的文化軟實力還相差甚遠,文化發展並不均衡,在世界文化市場上的競爭力還不强,在世界文化交流中的話語權仍然有限,甚至出現了“失語”現象。而學術著作的原創性和品質,代表了一個國家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研究水準,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表現。在現代中西文化領域的對話中,中國學界長期處於劣勢,學術話語權長期被西方壟斷,要改變這種現狀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這個過程也是中國學術從邊緣走向中心不可缺少的步驟(鄭杭生,2011)。中國學術在世界上的影響力不足,學術著作的數量和影響也趕不上學術本身的發展。因此,如何提高中國學術話語權,讓中國學術走向世界,一直是人們普遍關注的話題。提高文化軟實力,增強學術話語權,從失語走向對話等是中國學術的近期目標,而學術外譯是

實現目標的具體舉措。《選集(上册)》正是“探討在‘中國的世紀’來臨之際,負責文化傳播的翻譯工作者如何通過翻譯展現中國的傳統文化,幫助國家建立軟實力”(張佩瑤,2007)。當中國學界忙於承襲借用西方理論話語系統之時,張先生的《選集(上册)》無疑以實際行動發出了中國自己的聲音。《選集(上册)》一經出版便得到國內外學者的高度贊揚。“該選集打破了中古時期中國封閉的文化話語圈,有助於揭示翻譯在內向的(inward-looking)、單語的(monolingual)、整體的(monolithic)文化傳播方面所起的作用,同樣,也為譯界的共鳴和爭論提供了健康的載體”(Minford,2010)。美國麻薩諸塞大學比較文學系教授瑪麗亞·鐵木志科(Maria Tymoczko)評論說:“張佩瑤教授與中國翻譯研究的頂尖專家協調合作,出色地編輯了一部25年來可謂最具有開創性的翻譯研究著作。這部選集收錄了從最早期到20世紀的中國翻譯話語,使翻譯研究登上了一個嶄新的國際化舞臺,用英語展開了中西翻譯思想之間的對話和跨文化交流。張不僅闡述中國的翻譯理論,而且還有中國的歷史和翻譯實踐,同時將這些傳統史料與現代的翻譯框架聯繫起來,使翻譯研究擺脫西方的統治霸權,堪為其他學術研究的楷模。”(Chueng, 2006: xv)作為中國翻譯界第一部在國外出版發行的英文版中國傳統翻譯話語文集,《選集(上册)》具有非常鮮明的東方視野和特色(李紅滿,2008)。《選集(上册)》涉及的遠不止翻譯理論,在現代學說建立之前,文史哲之間的界限並不明顯,“往往史中帶論,傳中有論,隨寫隨論”(張佩瑤,2007),因此它的影響足以擴散到文化史、哲學史、思想史、翻譯文學和比較文學等方面。“不難發現,本書不僅適用於翻譯理論與實踐的學者們,而且對文化、社會歷史以及佛經研究的專家們也同樣適用”(Benn, 2009)。

學術話語權和理論自覺度的問題對當今中國尤其重要,張先生主持編譯的《選集(上册)》對於國際學術界了解中國傳統

翻譯話語具有重要的意義，是中國的翻譯論述、翻譯研究走向世界征途中的重要一步。它的問世突破了西方在翻譯研究領域文化“獨語”的格局，開闢了中西翻譯思想對話的先河。成為新時期中外文化交流和對話的先鋒模範，為提高中國的軟實力，增強中國學術話語權做出了突出貢獻。

## 二、“豐厚翻譯(thick translation)”<sup>[2]</sup> 是社科翻譯的基本模式

美國翻譯理論家阿皮亞(Kwame Anthony Appiah)首次提出了“豐厚翻譯”(thick translation)、“豐厚語境化”(thick contextualization)的概念，即在翻譯文本的過程中採用添加注腳、注釋、評注等方法，以便將文本置於具有豐富內涵的文化和語言語境中，進而使被文字遮蔽的意義和譯者的意圖相互融合(Appiah, 2000: 427)。阿皮亞認為豐厚翻譯使譯本語境化，因而讀者能夠獲得譯本產生的社會文化語境，由此產生對他者文化的尊重，並抵制英語文化的優越感。而譯者通過各種注釋和評注，重構出源文本產生時的歷史語境，以幫助譯語讀者更深入地理解源語文化。因此，豐厚翻譯可以使得文化的真實性和合法性得以彰顯，並使他者文化和邊緣文學發出自己的聲音。“豐厚翻譯”是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途徑，對今天弘揚中華文化，向世界譯介中國文化典籍作品具有很大的借鑒價值，對於固定和傳播語言文化於他者文化，具有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選集(上册)》是豐厚翻譯成功應用的典範。張先生考慮到外國讀者理解中國傳統文化時會受到中西文化隔閡、時空差異等影響，因而採用了“豐厚翻譯”的方法幫助讀者跨越理解的鴻溝。她詳細介紹了《選集(上册)》中“深度翻譯”的具體操作方法，即：(一)背景描述，利用作者簡介與注腳提供源文作者所處時代背景、政治局勢等資料；(二)解釋，“編者前言”仔細描

繪出佛籍譯論的六大特點,其主要目的的顯異;(三)深層鋪墊,營造一種歷史文化的縱深感和語義上的層次感(張佩瑤,2007)。運用“豐厚翻譯”的方法解釋中西文化的差異並使這種差異充滿吸引力、富有親和力,從而達到吸引讀者的目的。《選集(上册)》作為“豐厚翻譯”研究的範例,編譯者獨特的選、譯、評、注的編譯原則,尤其是注釋的應用,是《選集(上册)》獲得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據統計,《選集(上册)》的注釋總計328條(不包括引言部分的18條注釋),篇幅占全書三分之一強,為譯文正文提供了詳盡的解釋、背景材料及研究資料,既幫助西方讀者深入了解原文,也幫助懂英文的中國讀者加深理解,或以新的視野重讀傳統譯論,或作進一步研究(王雪明、楊子,2008)。

### 三、學術外譯過程中的合作

在翻譯主體間性研究中,翻譯活動中各種關係的和諧是保證涉及翻譯的各種因素發揮積極作用的重要條件,而積極、互動的主體間性使作者、譯者和讀者三者之間的和諧共存成為可能(許鈞,2003)。譯者應該是原作者最理想的讀者,同時又是原作者的“傳聲筒”,應準確地傳達原作者的意圖和文字背後的蘊意。中國傳統的佛經譯論滲透儒、釋、道各家經典,沒有中國傳統文、史、哲等方面的深厚積澱和修養,是沒辦法參悟明白、理解透徹的,更何談精準翻譯成外文。特別是其中一些文藝、倫理概念,如不了解它們在經典中積聚、負載的意義,不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觀,不“穿越”到原作者所處的時代和環境,不與原作者進行透徹的對話和交流,在翻譯時,根本不能把握源文的根本內涵和意義,也無法處理好文化適應和文化身份的問題,也就做不到源文的完美再現。然而,準確地再現源文,並不是要求譯者隱形,譯者的主體性允許譯者發出自己的聲音。“從1999年開始,她(張佩瑤)鼓動三五同道,窮七年光陰,潛心於中國舊

籍……”(王輝,2008)張先生與合作者<sup>[3]</sup>都具備深厚的文言功底和傳統文化素養,與佛學素有因緣,他們一起潛心研究中國傳統譯論典籍,搜集挖掘各方資料,與翻譯史論和佛經翻譯等各方面專家交流合作,對所選源文理解透徹全面,準確譯出源文思想及特色,在讀者群中產生了極大學術共鳴。《選集(上册)》的特色之處是譯者不僅對原作者意圖進行了忠實的傳達,同時也體現了譯者的主體創造性。《選集(上册)》中除了選擇源文文本進行翻譯(即“選”和“譯”)之外,每個條目還有源文背景注釋和編者評論(即“注”和“評”)。“注”和“評”即是譯者自己的聲音,是譯者的創造。“選”和“譯”是爲了呈現中國的譯學傳統史實,而“注”和“評”是“在現代學術觀照下對該條目做語境化處理”(張旭,2008)。這是譯者和原作者之間的協調合作,《選集(上册)》既傳達所選源文的內涵意義,又添加了自己的學術思想,讓傳統文化在現代有了第二次生命。作爲現代學術對話,這種對傳統文獻的譯介,還需在現代史學的觀照下,纔能產生深遠的影響。《選集(上册)》採用的這種方式既呈現了中國傳統的譯學史料,同時傳統和現代接軌,突出在現代學術背景下傳統譯學的意義。這是譯者和原作者的完美結合,這種合作讓《選集(上册)》更具學術價值和實用價值。

#### 四、學術外譯的出版

近年來,隨著國家政策對學術外譯的鼓勵和支持,以及學術界對學術外譯的重視和努力,學術譯作的出版呈井噴之勢。有不少優秀的學術譯作走向世界,向世界人民介紹中國傳統文化精髓,《選集(上册)》便是其中一例。然而不可否認的是,選題品位低下、翻譯品質參差不齊的譯作也不在少數,“儘管我們的翻譯品質總體上在提高,但是,令人擔憂的是,有些譯著的水準極其低下,讀者的反映很強烈;更爲糟糕的是,一些名著的翻譯

水準很低,在學術界產生了很不好的影響”(苗炎、鄧正來,2005)。這種現象既浪費人力、財力、物力,更達不到發揚傳播中國文化,促進中西學術交流的目的。“更令人憂慮的是,出版社以市場為主導,不得不爭譯、搶譯,無心審稿、校核、把關,無心對合譯專案做基本的統稿工作,更不會與譯者協商制訂合理的翻譯及出版時間表”(張佩瑤,2011)。因此,譯者必須提高學術翻譯的品質,同時,承擔著中國學術走出去重大使命的出版社也應擔負起相應的責任和義務。翻譯項目無論大小,如果没有出版社的配合、理解與支持尤其是編輯的把關,品質難以保證。因此,學術界與出版社的通力合作纔能保證中國學術成功地走向世界。《選集(上册)》的出版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範例。

首先,作為編譯者,張先生等嚴格保證《選集(上册)》的品質,耗時七年,帶病致力於中國古籍研究。以譯學專業的眼光,發掘中國傳統譯學精髓,整理譯注出令中外學者震撼的《選集(上册)》。特別是其嚴謹的學術翻譯,每字必究,從題目到引文評論等都力求精准,採用“豐厚翻譯”的方法增加注釋與評論,給中外學者提供了具有高度學術價值的參考文獻。

其次,世界範圍內出版譯著的機構不可勝數,但真正從事翻譯理論與實踐書刊出版的機構少之又少,《選集(上册)》由聖·傑羅姆出版社(St. Jerome Publishing)出版是一個明智的選擇。聖·傑羅姆出版社是世界上唯一一家專業出版翻譯與跨文化研究圖書的出版社。該社1995年出版了首本翻譯專業期刊《翻譯家》(*The Translator*),被公認為翻譯領域的重要國際期刊。此後,該社又出版了翻譯領域的許多高品質的論著、教材和參考書。張先生作為《翻譯家》國際諮詢委員會會員,與出版社保持良好的合作關係,《選集(上册)》的出版受到了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鼓勵。《翻譯家》的主編蒙娜·貝克教授(Professor Mona Baker),在張先生編譯《選集(上册)》過程中一直大力支持<sup>[4]</sup>。可以說,聖·傑羅姆出版社為中國學者提供了一個可以發出

“他者”聲音的平臺。學術無國界，高水準、高品質的作品是出版社應該努力追求和支持鼓勵的。這值得我們國內出版機構學習，努力打造一個專業、高水準的出版平臺，支持鼓勵中國學術發展，出版界與學術界共同合作，為中國文化走出去做出自己的貢獻。優秀的學術成果、尖端的科技理念、新穎的學科創造，如果不能够用出版的方式走出去，在全世界得到非常好的傳播，那可以說是打了折扣的出版活動。學術界與出版界要通力合作，不管是在自然科學方面，還是在人文社會科學方面，拿出讓世人信服的內容、讓人敬重和敬仰的成果，這是學術界與出版界共同的使命和擔當。在出版物的呈現形式上，要採用西方人能够接受的方式，向世界說明中國的文化、中國的學術、中國的文明，不但要走出去，還要走進去、走下去、走過去，這纔是最理想的境界，纔能對全世界做出應有的貢獻。

## 五、結語

在國家“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教育部“推動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繁榮發展”和大力支持鼓勵哲學社會科學學術外譯等政策背景下，張先生編譯的《選集（上册）》無疑給國內學術外譯工作樹立了成功的典範。《選集（上册）》可以說是最具有開創性的翻譯研究著作，它的出版打破了一直以來翻譯研究界西方獨霸的局面，用英語展開了中西翻譯思想之間的對話和跨文化交流，使中國翻譯研究登上了嶄新的國際舞臺。“豐厚翻譯”作為社科翻譯的基本模式，在《選集（上册）》中得到了完美呈現。《選集（上册）》在學術外譯過程中的譯者與原作者合作、學術界與出版社合作等方面都堪稱楷模，可為以後學術翻譯提供借鑒。然而，大業未竟，《選集（下册）》尚未付梓，先生卻已作古。張先生在中國傳統譯學領域鞠躬盡瘁，為學術事業奉獻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她為翻譯學科的建設和發展、為中國文化走出去和中



國國際地位的提高做出了重要貢獻。後學永遠緬懷先生！

致謝：本文寫作得到了陝西師範大學研究生創新培養基金(2013CXS027)資助，特此致謝。

陝西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 張霄軍  
陝西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碩士研究生 胡勤玲

**注釋：**

- [ 1 ] 張佩瑤教授(2007)曾提到《選集(上册)》“不但有對外的目的,還有對內的目的,那就是在國內引起重讀傳統譯論的興趣”。
- [ 2 ] 有的學者(王雪明、楊子,2012;王輝,2008)將 thick translation 譯為“深度翻譯”。張佩瑤教授的譯法為“豐厚翻譯”,而且認為 thick translation 是深入全面譯介中國翻譯話語中的核心概念,詳見 Cheung (2007)。
- [ 3 ] 譯者除張佩瑤教授之外,還有香港浸會大學黎翠珍教授(Professor Jane Lai)、香港大學余丹教授(Professor Diana Yue)和資深譯者 Cathy Poon。還有許多翻譯界前輩和知名學者參與詞條收集和編譯顧問工作,包括中國翻譯協會顧問林茂蓀先生、中國社會科學院羅新璋教授、外交學院范守義教授、中國科技大學黎難秋教授、北京大學劉樹森教授、清華大學王寧教授、香港理工大學朱志瑜教授、西南交通大學傅勇林教授等。
- [ 4 ] 張佩瑤教授仙逝後,蒙娜·貝克第一時間發表悼文紀念張先生,贊頌張先生的成就與個人品質,並表達了痛失這樣一位著名學者的悲痛之情。